

討論張耀仁的小說《親愛練習》與《死亡練習》中對於多元族群的重省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 辛啟緯



死亡練習

張耀仁著／九歌／201404／248頁／21公分／280元／平裝
ISBN 9789574449354／857

女性婚姻移民的現象在臺灣早已不再是新鮮事，早於1980年代外籍配偶已經出現在臺灣農地漁村，數十年累積起來的龐大人口重新排列了臺灣的社會結構，她們的身分也由「外籍新娘」和「大陸新娘」推移為更加政治正確的「新住民」，成為組成臺灣多元族群的一份子。然而由子女教養、家庭暴力、工作權利等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猜忌，讓許多外籍配偶仍然浮沉在臺灣社會的偏見、歧視，以及監控之下，她們幽微難言的情緒，證明了臺灣離共榮共和的多元族群社會還很遙遠。

延續著《親愛練習》中對臺灣少數「她者」的關心，這一次張耀仁在《死亡練習》中矛頭對準的她者，是從東南亞和大陸來到臺灣的外籍配偶。她們遠離原生家園，藉著一紙契約來到另一個語言、文化的新環境，等待著她們的大多是在經濟、情感或身體上挫敗的男性；來不及披上白紗，她們已先穿上圍裙；來不及談情說愛，她們的肚腹已一天天隆起，她們完整了數不清的頹傾家簣，但一扇又一扇文化和階級的隔膜總是將她們拒於門外。

「她們的河，是我們迄今尚未理解的洶湧與伏流。」寫在《死亡練習》的卷末結筆或許可視作張耀仁自《親愛練習》以來的創作繆思。比起他曲折的文字，張耀仁的書寫意圖容易理解的多——地球村讓整個世界觸手可及，但相應的多元族群議題卻往往被封存，我們理應談論全球化之下的新版圖，但事實是人們仍慣性的跪拜在某種文化、膚色、語言的寶座前獻媚，縱容一個個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在我們身旁蔚然成形。

《死亡練習》中的十四個黃美化化身，用頸、用腹、用獸一般的身體告訴讀者，每一個你所知道的異鄉人故事，無不是過度簡化的單幕劇。這並不是說它們不嚴重或不真實而是太容易了，我們無須深入調查或是尋訪實際案例，也能夠在腦海中描畫出一個個外籍勞工、配偶或新移民女性的形象，以及夾帶其中的委屈與苦情。但同時，她們手握的理應是抹布、鍋鏟、輪椅的手把和狗繩。她們的肌膚是暗、沉，而非深邃如黑珍珠的色澤。而我們，竟將這樣的暴力給自然化了。



我不禁想起迷幻搖滾名曲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中，面無表情的孩子步在輸送帶上一個接一個跳進巨型絞肉機的畫面，Pink Floyd 控訴教育體制將人變成一塊塊相同的磚。對於進入寶島的她們，我們是否正如同那條輸送帶一樣，為她們製模、灌漿、脫蠟，在背後打上 *Made in* ——，然後，好整以暇的打開監視器，日復一日監管她們模糊而相似的面容。

而張耀仁的書寫，正是將她們自監視器底下解放出來的一次嘗試。他說，小說的共通命題都在於「如何重拾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核心尊嚴」。文本中交替出現的獨白與對話是這個命題最明顯的實踐；對話體表達新移民女性在臺灣社會反覆被商品化、工具化甚至情色化的受迫待遇，獨白體描繪她們不被認受的疏離感。緣著壓迫與疏離而生的巨大孤寂使她們僵化成一座座人海孤島。在〈因為在黑暗裡〉的精神出軌，〈馬鞍藤之眼〉中被矮化的困頓和〈死亡練習〉中的昏厥體驗，都是她們遭逢異化的吶喊與呼救。張耀仁切換兩種敘事體交響辯詰，一再重申各種被自然化了的剝削過程淹沒了她們的聲音，也斬斷了理解他人的所有可能。同樣的，也透過揭露這些暴力之下的荒謬場景，讀者得以窺見她們不只是勞力契約、婚姻契約、道德契約下的生產工具，她們的困惑、恐懼、慾望，都表明了她們飽脹的人性，她們每一個令人莞爾或啟人疑竇的行為都是文化身分的體現，而這些差異都值得我們尊重，並持續地練習與之共存，與之親愛。追根究柢，《死亡練習》即是理解他人的練習。

藉由塑造形象不一的黃美美，張耀仁同時也一次次力行自我修正，他並不鍾情道德說教或是苦情悲劇的實況報導，他的人道關懷的精闢之處，在於不斷探詢理解她者的妥善路徑：十四個黃美美的故事提供了十四種理解她們的方式，小說中變化繁複的視角逼迫讀者改變身分，從而感受不同世界的規律，這個技法不乏有向觀眾挑戰的意味，「對於我所能書寫的她們，你能夠了解多少？」、「你有沒有看見契約婚姻中混雜的尊與卑、富庶與貧困、丈夫和妻子、雇主和勞工，主人與奴隸結構？」在這個壓力氛圍下，讀者無法在安坐在監視螢幕之後，而得將自身捲入小說複雜的人際版圖中，和張耀仁所披露的十四個黃美美一同思索如何與身上非與生俱來的標籤角力／共存，思索「可睡、可生孩子、可工作」的功能如何侵蝕你對愛情的忠貞或對理想的不移矢志？

閱讀張耀仁的作品，最大的收穫是叫我們重省多元族群的陰暗之處；臺灣的文學及文化界對身分、國族（族群）的敏感度一向不落人後，這既是過去時代結構遺留下來的特色，也是當代臺灣的切身課題，也因為過去和現在的苦難仍歷歷在目，多元族群共存的探討才顯得格外重要。但是，實際上討論、介入、形塑自身與她者過程往往快速而武斷，使得剝削、支配與誤解總是層出不窮。在張耀仁關於外傭和外配的小說中，始終迴避直接地將她們刻劃為單一的受難族群，儘管受難事實具有強大的感染力，也有助於賦予她們更有利的位置，然而這同樣容易模糊她們殊異的面容，也遮擋對她者更細緻的解讀。換言之，張耀仁並非要提供她們超然或神聖的冠冕，而是極力在日常生活中解放出對話舞臺，讓她們能以各種聲音、理直氣壯的說出：我的名字是——。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不斷尋求新的理解與互動的可能，如果細究其背後的意義、將會使人更為動容。